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姚 遥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洲大陆在国际关系各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将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板块，具有契合新时代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在历史实践中，中非命运共同体解构了弱肉强食的强权均势体系，制衡了资本独大的“自由世界秩序”，促进了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二战后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重要稳定力量。在理论建构中，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整套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非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谱写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面向新时代，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方向，拓展与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相匹配的非洲问题研究路径，无疑具有日益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非命运共同体 非洲问题研究 历史意义 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 姚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流学科卓越骨干学者”，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37）。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5年多之后，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进一步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付诸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中非命运共同体从理论到实践，超越了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自然和社会因素，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体现。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其

意义和影响均大大超出了双边和区域范畴，正在而且必将影响世界，改变世界。^① 2020 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与非洲团结协作、共战病毒，中国积极向非洲国家及非盟提供抗疫援助，以实际行动践行北京峰会承诺，成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再次改写了“强权本位”或“资本优先”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叙事。

正如阿西斯·马拉基亚斯（Assis Malaquias）所言，“对国际关系的非洲理论来说，一个主要的挑战是避免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本质上是西方的和国家中心模式的国际关系学简单地适用到非洲。”^② 一种理论模式如要解释和预测非洲问题，就必须以非洲的历史事实为中心，非洲政治制度历来就是建立在多元化的民族而非同质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非洲问题中所内嵌的“国家”与“人类”双重身份的复杂互动关系，将促使非洲成为“21 世纪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③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方向，拓展与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相匹配的非洲问题研究路径，无疑具有日益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变化世界中的非洲与非洲研究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国际局势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一些西方国家呈现“既乱又变”的新特征。与此同时，中非关系历经时间洗礼和国际考验，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变化世界中的非洲与非洲研究，将为新时代中非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增添更强动力。

（一）变化世界中的非洲发展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权力重组、民心思变，世界出现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政治从欧美国家一路蔓延至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

① 吴传华 《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地位、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2020 年第 2 期，第 18 页。

② Assis Malaquias, “Reformul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rican Insights and Challenges,”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p. 11 – 28.

③ Sandra J. Maclean, “Challenging Westphalia: Issues of Sovereignty and Identity in Southern Africa,”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46 – 162.

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此消彼长紧密相连。少数私有者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二战结束后，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因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的修补而派生出一些新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改变上述基本矛盾，反而因经济全球化由大国强权垄断向着金融资本垄断过渡，既提高了全球范围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又在全球范围内强化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进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

美国从 1919 年巴黎和会跻身世界强权，到逐渐陷入“实业空虚、民利受损、国家举债、民粹抬头”的当前处境，既是其大国强权之路的百年轮回，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一环，预示着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必将经历深刻调整。在此消彼长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非洲大陆在国际关系各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愈益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

首先，非洲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争取支持的“基本盘”。中国正处于区域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关键历史阶段，既要应对强权国家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要应对其他国家的疑虑与猜忌。在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博弈中，中国更加需要得到非洲国家的仗义执言。例如，2016 年西方国家和媒体热炒南海问题，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得到 70 余个国家发声支持，其中 39 个是非洲国家。^②

其次，非洲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新高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常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非洲大陆日益成为中国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外部力量。中非双方在资源禀赋方面具有良好互补，非洲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有潜力成为中国产业梯次转移的重要区域。

最后，非洲是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与国家软实力的“舆论场”。进入新时代，非洲已成为中国突破“西强我弱”国际舆论格局的关键舞台。西方舆论时常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但在多数非洲国家看来，这两个议题恰是中国最可资借鉴的软实力资源——依靠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体制，带领本国人民勤劳生产，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

同时，随着非洲在变化世界中的权重增加，非洲问题也日益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英国借重英联邦的传统政治纽带，继续对部分非洲国家保

① 《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华网，2017 年 9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9/c_1121747887.htm [2020-08-08]。

②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戴兵谈习近平主席访非及中非关系》，中新网，2018 年 8 月 2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8-02/8586908.shtml> [2020-08-09]。

持话语权。法国通过法语联盟、法语国家及地区性国际组织持续对一些非洲国家施加影响。美国则以贸易为切入口，在 2005 年通过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并于 2015 年到期后又将其延长 10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欧非首脑会议、法国—非洲峰会、俄罗斯—非洲峰会、美非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印度—非洲峰会等国际合作平台相继涌现，加强在非洲的国际竞争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关切之一。

然而，一些国家的对非合作项目忽视非洲实际情况，无视非洲国家的迫切需求与长远利益。近期以来，受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上在东非肆虐的蝗灾，非洲粮食供应面临极大挑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非洲大约有 2.5 亿人，即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之前已没有足够的食物。^① 面对危机，合作不应成为大国对非洲国家的施舍或利用。中国对非政策的真诚情感和务实原则是中非合作的坚实基础，旨在通过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增强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持续引领国际社会对非合作的历史潮流。

（二）变化世界中的非洲研究^②

在西方理论视域中，非洲问题研究一直从属于非洲大陆作为强权争霸“角力场”的边缘化角色。凯尔文·邓恩（Kevin Dunn）提出，西方政治决策者造成的非洲大陆边缘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导致的非洲问题边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相关性。^③

首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聚焦国际关系中的所谓“大国”（或曰“强权”），始终将非洲视为国际结构中无足轻重的行为体。经典现实主义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于非洲的漠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其《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断言，非洲在二战之前没有历史，是一个“政治上的空白地带”。^④ 新现实主义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从未论述非洲，其出发点是“国际政治的一般性理论有必要立足于大国。”^⑤

① 吕强《非洲国家积极寻求粮食安全出路》，《人民日报》2019 年 2 月 20 日，第 16 版。

② 非洲研究，广义上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学科领域的非洲问题，狭义上主要指从社会科学层面开展的聚焦于非洲大陆历史文明进程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与国际关系研究。本文所指为狭义的非洲研究。

③ Kevin C. Dunn, “MadLib #32: The (Blank) African State: Rethinking the Sovereign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p. 46–63.

④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eace and Power*, New York: Knopf, 1985, p. 369.

⑤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p. 72–73.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中，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属于“前现代国家”，整个非洲处于国际关系理论等级体系中相对较低的位置。在他们看来，非洲因国家和民族的建构尚未完成，已成为“失败国家”的集中地，从而构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某种挑战。^①实际上，非洲偏离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单元的国际体系，恰恰根源于殖民时期的西方国际关系实践。近代以来，一些业已建立数百年的相对成熟的非洲国家被殖民者强行肢解，比如由刚果族于14世纪建立的刚果王国被分割到了葡属安哥拉、比属刚果和法属刚果，由巴隆达族于15世纪建立的隆达国则被分割在葡属安哥拉、比属刚果和英属北罗得西亚。^②回顾历史事实，西方强权的侵略与瓜分才是现代非洲产生边界争端与民族纠纷并进而成为所谓“失败国家”的政治根源，其对非洲传统国际关系的肆意改造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强行植入，使得非洲国家最终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某种变异体。这种变异体的内核是一种非正式的跨国政治，其特征是边界失灵与主权有限，导致“诸多宗教和种族等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展开竞争”。^③

其次，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在分析非洲问题时同样使用了一种狭隘的大国观。他们认为，目前非洲并不符合“自由世界”的标准，因而无需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加以考虑；之所以偶尔关注非洲，不过是受到了旨在复制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理论的激励。^④

实际上，摘下“自由世界”的身份面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核心并非制度，而在于对政治经济体系的控制权。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在所谓“自由世界”中，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包括3个亚体系——首先是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其次是居于中间的所谓转轨国家，它们部分地加入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最后是以非洲为典型的欠发达国家，它们持续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自由主义”诱导，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取消各类补贴、开放国家边界以促进所谓“自由贸易”。其结果是，如以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福利指数加以衡量，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明显低于20世纪60年代政治独立之初，贫富差

① Barry Buzan and Ole Weaver, *Regions &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19.

② 葛公尚《非洲各族的今昔》，载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0—126页。

③ Lisa Anderson, “Antiquated Before They Ossify: States That Fail Before They Fo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1 2004 p. 3.

④ Anna Dicks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1997 p. 8.

距日益拉大，社会保障持续恶化。^①

最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从社会学角度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权力、利益、均势、无政府状态等——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包括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纯理论”。然而，本质而言，建构主义仍然建基于一整套普世价值——西方优越论。^② 建构主义学派的主流研究可以归结为“体系（单向）社会化国家”或“国际规范如何传播”的理论命题。毋宁说建构主义理论是以“规范”之名，依据文明发展水平确立了一个等级体系，非洲再次因“各方面不够成熟”而被排除在外，被视作一个“反常的”亚体系甚或是需要被“建构”和“改造”的“罪恶之地”。^③

一些西方学者针对建构主义的隐含问题进行反思，指出社会化规范传播实质上是服务于各类强者的知识。^④ 换言之，规范只是表象，社会化的实质是话语霸权与话语强制。毋庸讳言，建构主义的社会化模型很少涉及国际行为体对规范结构的主动影响，似乎一切都在“命定”的观念之中。^⑤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便试图在国际规范层面建构某种“软霸权”，使任何不见容于所谓“自由世界秩序”的国家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很多时候“理不屈而词穷”。本质而言，在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在规范演进中的角色并不能一刀切地贴上“倡导者”或“接受者”的简单标签，西方主流建构主义学派所倡导的单一方向和结构的研究思路，与国际体系日益复杂多元的动态现实相距甚远。

总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非洲问题研究者开始质疑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特别是其对日渐浮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学说、思想、经验的漠视甚至歧视，其中又以对非洲为甚。^⑥ 近年来，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冲突等乱象叠加，一些西方学者依然执迷不悟地鼓吹所谓“强权均势体系”或“自由世界秩序”。有人迷信现实实力，提出“霸权稳定论”，主张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来统领国际事务；有人迷信自由制度，提出“全球治理论”，主张各国弱化主权，制定

① Robert Cox,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wer, Morals and Civiliz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84.

② 相蓝欣《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学海》2010年第1期，第160—165页。

③ 张春《中国的理论自信对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借鉴意义》，《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第44—62页。

④ Charlotte Epstein, “Stop Telling Us How to Behave: Socialization or Infant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3, No. 2, 2012, pp. 135–145.

⑤ 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01—110页。

⑥ Kathryn C. Lavelle, “Moving in from the Periphery: Africa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2, 2005, pp. 364–379.

共同的规则来管理世界；有人迷信观念建构，提出“普世价值论”，主张推广某一种自认为“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来一统天下。^① 还有学者提出，美国从领导席上退出，中国应填补权力真空，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对此，中方明确提出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外交理念观之，不论是安排权力、设计制度还是建构观念，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是在强权与主权、资本与人民之间，国际秩序应该“由谁主导”、全球治理又该“使谁受益”。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致信祝贺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再次宣示中非“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身处“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国际政治变局，面对“乱入池中看不见”的国际思潮论争，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

中国政府所认同的战后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既不是以强权政治为核心的所谓“雅尔塔体系”，也不是战后美国鼓吹的“自由世界秩序”，而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及相应国际体系。然而，战后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并非一蹴而就，面对世界强权与跨国资本，以中国和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国际斗争。正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亚当·沃森（Adam Watson）所指出，二战结束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国际规则和公约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②。在历史实践中孕育而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正是在此意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非命运共同体解构了“强权均势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所谓“强权均势体系”紧密相连，中国与非洲皆是强权政治的受害者。强权均势的表面是强权之间的均势与和平，实质却是强权对于势力范围的瓜分与支配。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1559年签订的《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第一次建立了把欧洲与其实行殖民化的地方分离开来的“和睦线”，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和平区，在其他地方则建立了一个战

① 《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3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zbz_673089/zyjh_673099/t1247689.shtml [2020-08-20]。

②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

争区，此后这种划分“几乎变成了一条法律原则，给了欧洲人以劫掠、攻击和定居的自由而又不会颠覆欧洲的和平”^①。在强权均势的表象之下，亚非拉的古老民族成为被瓜分与被支配的势力范围，比如 1884 至 1885 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便将欧洲列强对非洲大陆的强行分割正式“合法化”。

本质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皆是西方列强在大规模国际战争之后重划势力范围、分配国际权力、维持大国均势的秩序安排。以主权平等为规范的“强权均势体系”，实际上遮蔽了以弱肉强食为规范的全球殖民体系。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强先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寻求合作、重划世界，继而因矛盾无法调和而走向冷战。正如牛津大学教授文安立（Odd Westad）所言，冷战的悲剧在于，“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反对形式上的殖民主义”，然而它们的所作所为却“与它们的直接前任——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工程——极为相似”。^②

因此，如果仅止于大国实力的升降转移，二战后国际体系便称不上具有本质的进步。实际上，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最深刻变化，是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数量增多与实力增强。战后初期，全球各大洲都兴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殖民地、半殖民地、被保护国等纷纷独立，老牌列强的殖民体系逐渐土崩瓦解。截至 1990 年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在全世界 180 多个主权国家中，有近 100 个国家是在战后宣布独立的，其中非洲 48 个、亚洲 27 个、大洋洲 11 个、拉丁美洲 10 个。^③ 在短短 45 年间，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登上世界舞台，其规模之大、合力之强、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

在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非合作至关重要且厥功至伟。在漫长的殖民时期，非洲曾长期将西方文明视作主要甚至唯一的认知参照系。二战后，中国和非洲国家相继崛起并彼此支持。受中国影响，非洲在国际格局中逐渐获得新的发展参照系，彰显出作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价值和地位。中国也由于获得非洲国家支持而冲破西方封锁于 1971 年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

回顾历史，中非关系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中非双方在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团结合作、相互支援，加速了强权体系的瓦解，也必将加速与强权体系相配套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衰落。本质而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与“强权均势体系”相应和的。摩根索即宣称，

①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25.

② 文安立 《全球冷战》，牛可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年版，第 409 页。

③ 段炳麟 《世界当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3 页。

“强权均势”就像“万有引力法则”一样起作用。^① 冷战结束后，新现实主义理论家的研究焦点转变为——美国的单极霸权是否能够“帝祚永延”，抑或将有新强权出现并与美国形成新的“强权均势”？然而，中非关系的发展实践表明，作为一体之两面的“强权均势”与“恃强凌弱”，绝非国际关系发展的唯一逻辑。进入 21 世纪，中非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空前突破，超越了西方国家对外关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狭隘功利主义认知逻辑。中非双方在主权维护、联合国改革、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彼此支持，有力打击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构成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基础。

（二）中非命运共同体制衡了“自由世界秩序”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非洲面临新的国际挑战。1991 年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使得美、苏几十年来对第三世界的灾难性干涉的后果被遮蔽、淡化了”^②。苏联不复存在，美国延续了强权政治的精神实质——唯一不同的是，此前的双簧戏变为了独角戏，此前的美苏两大阵营变为了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美国标榜的“自由世界秩序”实质上是对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偷梁换柱。其支柱有三：其一，干预全球局势的超强军力和同盟体系；其二，独掌世界经济运转的制度设计和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三，作为软实力的“自由价值”体系和一系列配套观念。

然而，美国的单极幻象如昙花一现，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破灭。究其根源，资本主义进入跨国垄断的新阶段后，某种凌驾于主权甚至强权之上的资本力量蠢蠢欲动，无视国家主权约束与公平正义原则，试图打破一切国家的保护与边界，即便美国强权自身也深蒙其害，遂不得不因此发生民粹主义的反制与转型。

冷战结束后，与其说是强权国家，毋宁说是嵌入强权国家的垄断资本获得了“自由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在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将分隔两地的领土联系起来，突破了各种既存的政治规范与文化习俗的限制，正如理查德·巴纳特（Richard Barnett）和约翰·卡瓦纳（John Cavanagh）所言，主权国家正逐步丧失对以往领土的控制权，必须更进一步地适应外部世界的要求，因为

^① John F. Clark, “Neo – Realism and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op. cit.* pp. 103 – 111.

^② 文安立 《全球冷战》，第 416 页。

内外世界已合二为一。^①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组织也成为垄断资本的化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揭示,一些国际组织以贷款为诱饵,通过四个步骤——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实际上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了经济主权。^②尤其在非洲大陆,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恶果。1981年,世界银行发布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史称“伯格报告”),诱导非洲国家将经济主权让渡于国际资本力量。非洲国家独立之时,大多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收归国有,“伯格报告”则是对收回经济主权的一次历史反动。比如,该报告要求非洲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生产的补贴,时任赞比亚农业部长在发现本国市场被跨国公司占领后愤怒地指出:“你看欧洲和美国,它们在补贴农业,但它们却对我们说,‘不要补贴农业!’你问它们——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③

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正是以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蓝本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经常鼓吹,1945年后在美国领导之下,国际政治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变化——各国被不断增多的制度与规则捆绑在一起,美国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的执法官,因为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也被大量的多边规则限制住了。^④类似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不吝褒扬,核心理由即是通过“规则”限制甚至消解国际强权,从而赋予世界各国及其人民以“自由”。然而,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直言,“自由这一词汇所指的并非公民的自由,而是资本的自由”,“自由世界不能容忍的不是缺少议会或者缺少集会的权利,而是废除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制”。^⑤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进一步揭示,自由化仅仅是强化了非洲大陆发展的不平等。^⑥以非洲的经验观之,自由民主的扩散非但没有解决大多数矛盾,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恶化了内部的社会斗争,并导致收入分配鸿沟持续扩大。正如坦德卡·恩克维妮(Tandeka Nkiwane)提出,非洲大陆的和平前景与所谓“自由民主”少有关联,而与社会经济的自主发展与公平分配具有更

① [美] 理查德·巴纳特、约翰·卡瓦纳 《跨国企业与世界新秩序: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彭志华等译,海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

② Gregory Palast, “Stiglitz VS. The Bloodsuckers: IMF’s Four Steps to Damnation,” *The Observer Magazine*, April 29 2001.

③ 舒运国 《失败的改革——20 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 页。

④ Steven Bernstein, “God Gave Physics the Easy Problems: Adapting Science to an Unpredictable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 2000 pp. 43 – 76.

⑤ [英] 佩里·安德森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金城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0 页。

⑥ Samir Amin,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e in Black Africa –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Form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0 No. 4, 1972 pp. 503 – 524.

大的关系。^①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力推进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积极探索走适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对冲并解构了由跨国垄断资本所实际操控的“自由世界秩序”。新时代中国的对非方略，恰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遗患的一剂解药。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首次将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问题提升至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高度，制定了携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以助力非洲建设，造福中非人民，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进而为中非关系与非洲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规划，实质上是提出了有别于“跨国资本”逻辑、以加强自主工业化为核心的非洲发展蓝图。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纵观历史，中非关系的发展历程恰是“文明对话”的生动展现，也构成了对“文明冲突”等西方话语的根本性消解。

二元对立是西方文明的哲学基础。在古希腊时代，尽管哲学观点百家争鸣，主流观点却认为大千世界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本质特征，毕达哥拉斯和阿尔克迈恩的学说，被亚里士多德归纳为简单的一句话：对立是存在物的始基。^②对西方现代哲学影响深远的黑格尔也强调“对立”与“他者”的特殊作用，认为个体需要一个与己对立的他者，才能最终找到自我。^③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表示“只有当我们不是谁，而且经常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反对谁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④这一思维传统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准则。从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野蛮人”概念，基督教时代的“异教徒”概念，一直到启蒙运动时代的“文明”与“野蛮”之区分，不难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秩序中一条隐含不变的基本政治逻辑——内部强调人人平等，外部充斥敌我对立。

16世纪以来，新兴的西方强权依靠其国家暴力，将统治意志延伸到国界之外，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与生态的分界，强行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分配资源和产品，其所宰制的不只是土地和人口，更企图宰制各地区人民的记忆和意识，使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成为“没有历史的野蛮人”。在非洲大陆，殖民者有意保

① Tandeke C. Nkiwane, “The End of History? African Challenges to Lib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op. cit.* pp. 103 – 111.

②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③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页。

④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留、甚至发展落后的部落制度；为了分而治之，有意制造民族隔阂，破坏非洲的传统文化，用宗主国的语言排挤、代替民族语言；在殖民者人数较集中的南非和罗得西亚，他们以暴力为基础全面实行了骇人听闻的种族隔离制度。直至殖民体系瓦解，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仍未结束，非洲依然被西方主流视作“化外之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明言“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施及于阿尔巴尼亚人或布基纳法索人的奇思怪想作用甚少，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人类共同意识形态遗产的东西。”^① 1971 年 10 月，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在与尼克松总统的电话谈话中，对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非洲国家代表充满歧视，妄言“那些非洲来的猴子连鞋子都还穿不习惯”^②。

在理论视域中，形形色色的“文明等级论”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体之两面。实际上，与建构规范相联系的软实力或曰同化性权力仍然是以霸权为中心的。有评论指出，通过将内嵌于全球制度中的观念、规范和价值进行普世化，美国强权一直施行着某种深度的权力。^③ 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承认，构成国际权力关键来源的，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化和它建立一系列管理国际事务的有利规则和制度。^④ 然而，在中国哲学视域中，“普世价值”的概念并不存在，中国人历来尊重彼此之间的现实差异，并不认为自己的某种价值或观念必须强加于他者身上。中国自身改革转型和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实践丰富多彩，很难简单用“融入”“普世”“社会化”等词汇或“修正国”与“现状国”的二分法来概括，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单向度逻辑首先就难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⑤

中非合作历来重视文化融通、尊重彼此差异，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国对非政策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非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谋求任何特权，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延续与继承，深得非洲人心。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the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16 No. 16, 1989, pp. 3 – 18.

② Isaac Chotiner, “How a Historian Uncovered Ronald Reagan’s Racist Remarks to Richard Nixon: Tim Naftali Published the Text and Audio of a Taped Call from 1971 in which Reagan Described the African Deleg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Luridly Racist Terms,”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August 2, 2019.

③ Janis Westhuizen, “Marketing the ‘Rainbow Nation’: The Power of the South African Music, Film and Sport Industry”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op. cit.* pp. 64 – 81.

④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p. 177 – 192.

⑤ Pu Xiaoyu, “Socialisation as a Two – 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4, 2012, pp. 341 – 367.

(Yoweri Kaguta Museveni) 曾有感而发 “西方统治者总是自大狂妄, 又爱多管闲事。只有中国恭恭敬敬地把你当作一个国家的代表来打交道。”^① 近年来, 中非人文交流稳步拓展,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非关系最大的 ‘义’, 就是把中国发展同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够促进中非双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 还能够彰显人类致力于实现自他兼利的人性光辉与文明境界。

中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致力于推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 中国率先行动, 向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派出传染病专家和医务人员; 2016 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埃塞俄比亚上千万民众遭受饥饿威胁, 中国又在第一时间送去救援粮食。非洲国家和人民亦不忘恩情、投桃报李, 除了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给予政治、道义和法律上的鼎力支持, 在中国遭遇急难问题时也每每伸出援手。2008 年中国汶川遭遇特大地震灾害, 人口仅 200 万的赤道几内亚一次性对华捐赠 200 万欧元; 2010 年玉树地震后, 仅有 300 万人口的 “重债穷国” 刚果 (布) 也先后捐资 300 万美元。

当前, 国际抗疫合作再次彰显了中非患难见真情。2020 年 2 月, 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时刻, 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宝贵支持, 人口不足 100 万的吉布提第一时间向中国捐赠了 100 万美元。及至 3 月中旬, 疫情在非洲暴发, 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 26 个非洲国家提供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隔离眼罩、额温枪、医用手套和鞋套及呼吸机等全配置诊疗设备。2020 年 6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提出, 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方抗疫行动, 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方来华采购抗疫物资, 并将提前于年内开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 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③ 中非合作抗疫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一次生动呈现, 中国与非洲坚定不移站在一起, 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 以事实证明团结合作才是抗击疫情的最有力武器。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

非洲谚语有云: 非洲常有新事物。然而, 就非洲问题研究而言, 正如拉里·

-
- ① [英] 斯蒂芬·哈尔珀 《北京说了算》, 王鑫、李俊宏译, 八旗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 页。
②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全文)》, 新华网, 2015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04/c_1117363197.htm [2020-07-18]。
③ 《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全文)》, 新华网, 2020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7/c_1126127508.htm [2020-07-20]。

斯瓦托克 (Larry A. Swatuk) 所问 “世界上受苦的人们能够找到走进国际关系话语中心的道路吗? 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能够实现转换吗?”^① 在中国, 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囿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窠臼, “纯理论先行” 成为一个基本方法, 也成为流行的学术评判标准。然而,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绝不是从原则出发, 而是从实践出发, 研究国际问题的前提 “不是某种哲学, 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②。

(一)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基础是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的融合性继承, 也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与创新。在中华传统文明看来, “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且难以避免的, 强与弱、富与贫也是常见的矛盾关系。然而, 在中国哲学思维中, 矛盾双方必须遵循相应的伦理与规范——强者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 弱者不能自甘堕落、依附强权, 唯有 “强者重道, 弱者重节”, 才能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社会与天下。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摈弃了 “无政府” “强权均势” “自由资本” 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观窠臼, 认为人类世界既不必然是无序的, 也不应该由强权或资本主导并维持秩序, 而应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 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通往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一方面, 新型国际关系是对大国强权的抵制, 正如恩格斯指出 “不实现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现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③ 另一方面, 新型国际关系也是对垄断资本的抵制, 列宁曾指出 “对金融资本最 ‘方便’ 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④ 因此, 主权国家在现阶段仍是国际体系的主体, 是保护各国人民免受侵害的堡垒, 更是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唯有强化主权国家的自生能力, 优化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规则, 才能更好地维护天下苍生的权益和福祉; 唯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积累条件。

① Larry A. Swatuk, “The Brothers Grim: Modern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rn Africa,”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op. cit.* pp. 163 – 18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311—31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49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7 卷,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95 页。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建立在中华民族崇尚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文明基础之上，也体现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自由的终极理想。马克思终其一生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旨在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从封闭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走向开放的、全球的、人类的世界历史。^①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引领的资本全球化既未能解决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自主发展难题，也未能解决好全球范围内对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甚至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造成了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美英等国出现“逆全球化”的民粹势力与政治浪潮。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实现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提高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工业化能力，又助力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与就业增长，同时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优质产能、技术与标准出口，推动世界经济脱虚向实，从而最终形成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良性循环。

当前，中非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板块。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能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样板。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表的《北京宣言》中载明“中非要携手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之路”，这是中非关系60多年来发展演进的必然选择，契合双方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维护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示范。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北京峰会提出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其中的“四个不能”与“八大行动”尤为引人注目，标志着中非合作正式全面进入“黄金时代”。

（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

究其根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陷入了割裂物质与观念的机械思维误区。首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物质本体，体现为权力的本体或体系结构的本体，它们反过来物化了无政府状态。其次，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制度本体——本质上仍是物质本体，区别是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可以改善和进化的。最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观念本体，以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来解说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然而，过分强调观念和文化的意义，忽略了物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294页。

因素的长期性价值，也便倒向了另一种“深刻的片面”。^①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关系视为客观存在，设定国际关系的本原是物质，不愿意承认观念的作用与影响，认为观念只是物质的从属，物质力量才是国际关系发展演进的本质推动力量。虽然两派学者都没有称自己为“物质主义者”，但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通常把权力、利益和制度当作物质因素。正如徐秀军指出，实际上，两个学派都坚持物质本体论，也都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观念力量，都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传统的延续。^②

建构主义则是隐蔽的“意识决定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1992 年在《国际组织》发表关于“强权政治的社会建构”的论文，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温特坦陈，建构主义虽然反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核心，但却认同它们的科学方法。^③ 正如倪世雄所揭示，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其认为对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本身，国际体系的结构最终是由赋予这些结构以实际意义的“社会意义的结构”所决定的。^④

与西方国际关系学派不同，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一方面，“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⑤ 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⑥ 在研究非洲问题时，必须首先尊重客观物质条件。在非洲，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对其历史发展存在关键性影响。比如，在南非的几个欧洲移民殖民地中，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消灭了两个土著民族——科伊人和萨恩人，但却受到班图人的有力抵抗，郑家馨认为其原因应在三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寻找——萨恩人过于长久地停留在狩猎经济，科伊人一直没有超出单纯游牧经济的范畴，而班图人的牧农混合经济能够较好地适应和利用南非的自然条件，促进生产力的

① 李义虎 《本体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观察》2005 年第 1 期，第 16—21 页。

② 徐秀军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132—135 页。

③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④ 倪世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美国问题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18—23 页。

⑤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6 页。

提高和社会组织的发展。^① 研究和探索非洲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助于深入了解其不同历史命运的深层根源。

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② 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各民族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探索,马克思本人就很重视传统观念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他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 马克思既关注政治活动的当下经济基础,也重视传统观念的历史文化惯性,认为其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研究非洲问题时,须重视非洲民族、种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传统因素,及其所引致的一系列具有非洲特色的国际关系发展实践。比如,2019年6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决定于2020年正式发行区域单一货币埃科(ECO),以取代西非法郎及各国现行流通的本国货币,并决定组建西共体联邦银行,实行统一管理。这种不同于传统区域一体化的“新地区主义”实践,必须在历史文化的视域中才能够得到更加深刻的阐释与预测。^④

(三)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论

本质而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的认识论基础并无差别,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同变种。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确立的优势地位是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认识论来看,西方中心主义正是对这种优势地位的一种扭曲性反映。

首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认识论是以强权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学派有一种持久不变的信仰——国际政治永恒不变的无政府状态。强权的兴衰被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是国际体系的长期特征——不管强权如何兴衰浮沉,他们的理论却永远可以解释推定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复原力。^⑤ 以现实主义理论观之,强权天然地来自西方,以强权为中心即是以西方为中心。对于大多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① 郑家馨 《论十九世纪以前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载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史论文集》,第49—77页。

②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④ Deutsche Welle, “Africa’s CFA Franc – Colonial Relic or Stabilizing Force?”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905280011.html>, May 27, 2019.

⑤ [英]理查德·利特尔 《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刘德斌译,《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第1—16页。

家而言,理解历史是与理解欧美国家体系如何出现、继而又如何支配世界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强权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遂成为一母同胞。

其次,自由主义学派的认识论是以资本为中心的。2017 年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认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不可或缺,因为它“使弱小国家获得了体制上的机会,享受着美国威力所提供的庇护”。^① 奈的说辞既回避了美国强权政治的历史实践,也忽视了跨国垄断资本的时代特征。新自由主义的确支持全球化,但正如与奈合著《权力的相互依赖》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揭示,真正的问题是“资本劫持了全球化”。^② 以自由主义理论观之,资本的母国来自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即是以西方为中心。正如斯托瓦克所论,考虑到非洲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处于相对弱势,这块大陆在采取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方面要抵制西方的压力“最不可能”——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一直被西方人把持、为西方人服务,因此更多地源于贸易和金融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而不是外交部。^③

最后,建构主义学派的认识论是以规范为中心的。建构主义在实践中的作用是将不同文化和种族纳入西方认知的规范,其核心概念是社会交往。建构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交往的国际关系含义作过如下界定“将行为者纳入既定的共同体的规范和游戏规则的过程。”^④ 毋庸置疑,非西方国家行为体入围的前提,是必须接受这些规范和游戏规则所赖以生存的西方母体。

建构主义的“西方中心论”是深藏不露的,其立场早已确定,彼此心照不宣。温特曾坦言“由于我理想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很多人以为我在认识论方面必定与后实证主义的立场相吻合,其实不然,我是相信科学的,这就使我在第三次辩论中处于中间位置,但这不是因为我想寻找一种中性的方法,而是因为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并不表明要遵循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⑤ 温特明确拒斥对西方价值观发起挑战的后实证主义,这是建构主义理论维护“西方中心论”的直接体现。

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论,不是基于某个中心的普世价值,而是关照所

① Joseph S. Nye Jr.,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 10–16.

② Jeff D. Colgan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Liberal Order is Rigged: Fix it Now or Watch it Withers,”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3, May/June 2017, pp. 36–44.

③ Larry A. Swatuk, “The Brothers Grim: Modern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rn Africa,” in Dunn K. C. and Shaw T. M. (eds.), *op. cit.*, pp. 163–182.

④ 相蓝欣《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学海》2010年第1期,第160—165页。

⑤ Alexander Wendt, “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Unifying Physical and Social Ontolo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No. 4, 2015, pp. 872–874.

有成员的共同价值。所谓“共同价值”，是你有、我也有，因此“不约而同”。所谓“普世价值”，是我有、你没有，所以我要以此来“建构”你。针对这种以普世价值为幌子的“西方中心论”，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提出，中国与日本都有一些人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对方的，因此凡是符合西方的都标记为“先进”，反之则成为“落后”。^①一言以蔽之，他们将西方经验看作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元化”真理，没有西方作为参照物便不成其为自我，这种傲慢与偏见在日本引发了“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同理，在非洲问题研究中也必将引发“没有非洲的非洲研究”。

研究非洲问题与中非关系，就是要在多元化、相对性的认识论基础之上，把中国、西方国家、非洲国家等各自放入符合其历史传统的特殊脉络之中，继而再将它们汇于一处，最终整合出更高层面的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图景”。实际上，“中国的特殊性”“非洲的特殊性”与“西方的特殊性”并不冲突，各自来源于不同的自然条件与传统文化。“多元共生”的认识论排除了浅层次的“东方—西方对抗”模式，世界是多元化的，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说到底，源于西方的理论必须按照当地的语境、经验、实际进行有效的解剖、修正和重组，这是我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也是从事非洲研究所要重视的课题。

（四）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以“理性人”及其衍生而出的“逐利行为体”和“无政府状态”为方法论基础。虽然两派所强调的侧面不尽相同，但研究层次都是国际体系，都认为体系理论才可以称为国际关系理论。在体系层次上，二者的研究起点又都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而国家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体，其行为逻辑的出发点是在理性主义指导下的追求权力与利益。^②

本质而言，新现实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通过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来解释国家行为、分析国际政治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简而言之就是从个体出发、以个体行动者为取向来理解整体，对整体的理解来自于对个体的剖析。与之相比，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有了关键突破，即从个体主义转向了整体主义。^③整体主义方法

① [日] 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27 页。

② 秦亚青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论辩论的终结》，《国际论坛》2001 年第 3 期，第 6—13 页。

③ 袁正清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 页。

论的分析起点是整体，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行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体行为者总是被嵌入国际体系的结构之中。具体而言，规则或制度不仅制约了个体行为者的行为，也定义了个体行为者的身份。应该承认，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上，建构主义比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具有显著的进步。然而，其所主张的整体特征却并非来源于物质世界，而是由观念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具有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与建构主义将整体的本质特征引入观念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整体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①在马克思看来，整体性是指事物诸方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性。整体性方法是用整体性视野来看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将个体的对象和客体置于多重结构和复杂关系中来辩证分析，个体的思想和意志只不过是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某种体现。以物质结构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既是确立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建设的方法论指导。^②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是唯物辩证法，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既是理论工具，又是实践工具，是认识方法与实践方法统一的、科学的和完整的方法论，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种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③

中非命运共同体在方法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处。《礼记》有云：“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身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中国先哲早已洞悉：若想使国内外和同为一体、凝聚似一人，一要贴近对方、了解对方，即“必知其情”；二要阐明道理、表明原则，即“辟于其义”；三要通晓利害关系、善于解决困难，即“明于其利，达于其患”。

作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和路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要“明于其利，达于其患”，致力于解决非洲各国的发展难题。“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是以互联互通为纽带，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聚焦关键通道、关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8 页。

② 张云飞 《马克思总体性方法及其学科建设意义》，《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 7 期，第 57—6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 页。

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①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实现人的发展，致力于使非洲先天不利的“自然之患”得以有效改善，从而促使其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潜在优势尽快转化为现实发展的成果。

结 语

中非命运共同体之所以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具有深刻理论价值，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整套超越西方国际关系学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强调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均势论”（毋宁说是“强权均势论”）和“自由世界论”（毋宁说是“自由资本论”）。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突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物质本体论”或“观念本体论”的机械思维误区。它坚持以历史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融合“多元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摒弃了“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论窠臼。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践，致力于解决非洲国家的实际问题与现实矛盾。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次病毒基因挑战，其所映射出的国际关系矛盾也预示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一场理论基因变迁。展望未来，中国不可能通过移植、照抄西方理论与话语来阐释和解决中非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知识建构与学术探索之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非洲研究院应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②下阶段，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应着力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方向，融合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非洲研究拓展中国路径，为中国外交实践持续提供贴近中国特色、贴近非洲实际、贴近时代需求的理论营养和学术支持。

（责任编辑：吴传华）

①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年5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2020-06-15]。

②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新华网，2019年4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09/c_1124343566.htm [2020-08-08]。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Yao Yao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dea of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which also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diplomacy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idea ha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In historical practice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s de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balance of power featuring the strong preying on the weak ,challenge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based on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promoted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s. It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tabilizing force up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UN Chart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ory building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s provided a series of worldview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go beyond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the face of COVID – 19 ,China and Africa have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in solidarity to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nd have ushered in a new chapter in building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it is undoubtedly of increasingly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dv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o expand research approaches to African issues that a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research on African issue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oretical value

Author: Yao Yao , “Excellent Backbone Scholar of First – Class Discipline”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Director of Center for National Soft 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7) .